

祖国母亲我爱你!

□ 谢美莲(印尼归侨)

父母从印尼回来劝说,也动摇不了我建设祖国的决心

进入七十年代,父母的家业不断发展,经常写信叫我回家。由于我的弟妹分别于1973年和1979年先后申请回印尼了,国内只剩下我一人,父母要我回去的心更加迫切。于是我72岁的母亲不顾体弱多病,在妹妹、弟媳陪同下于1980年9月到广州华侨新村来看我。我望着年迈的母亲,心头一酸,感到自己没尽到做儿女的责任,但是一想到祖国大家庭需要更多的儿女来建设,我的心就平静下来。我讲拨乱反正后国家出现的大好形势,讲党和政府对归侨特殊照顾的政策,讲将来祖国强大了海外侨胞腰杆就硬了……母亲听我说得在理,不再强求我回去。

1985年8月,我80岁高龄

的父亲由于思念阔别52年的故土和女儿这一家子,便独自一人从印尼雅加达乘飞机到香港,再由香港到南京,由南京改乘火车到徐州。在南京期间,父亲受到江苏省侨联的热情欢迎,特派专车游览中山陵、玄武湖、雨花台烈士陵园、长江大桥等。在桥头堡照相时,我父亲不断大声说:“太雄伟,太壮观了!”

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徐州,矿务局领导及专车早已等候在火车站。到韩桥矿,正值中午,我们带着父亲到食堂的餐厅,香喷喷的美味佳肴等着为我父亲接风洗尘,父亲感动地连连点头说:“祖国没有忘记海外游子。”为了让父亲多游览名胜古迹,矿里还派专车及摄影师、医生陪同到曲阜、徐州等地参观。



母亲回国探亲

努力工作 实现愿望

我在韩桥矿科研室工作,负责全矿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任务。围绕提高煤炭产量,大搞技术革新。有一年全局推广清扫矿车的清车器制造技术,我带应技术革新小组到临近的矿去参观学习,骑自行车来回三十里。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不顾天气寒冷,在露天场上对着清车器画草图量尺寸,手冻得握不住笔也要坚持画完图才休息。回到矿里,连夜把清车器的施工设计图画出来交到制造车间去施工。由于大家干劲足,很快就把一台清车器制造出来,经过试运转每天能清扫50辆矿车,节煤30吨,效率比人工提高20多倍。

我不仅积极革新,还十分重视总结革新经验。1979年下半年,韩桥矿洗运科革新成功洗煤机。这一重大成果引起重视,要求整理成材料上报评奖,刊入科技材料汇编,我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。亲临现场了解情况,请有关同志座谈讨论,到图书馆、资料室、

借阅资料。自己忙不过来,请爱人帮助。终于在一天凌晨四点钟脱稿,又不顾休息,送到徐州参加评比,获得二等奖。

我在韩桥矿工作20年,生活上、工作中各种困难的考验和磨练,使自己变得更坚强。我认真努力工作,尊敬师长,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,把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抓紧完成。组织也给了我很多荣誉,如担任贾汪区、徐州市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。还当过江苏省侨联委员、徐州市侨联常委。其它如徐州市的妇代会、工会等出席过。

徐州矿务局是百年老矿,百里煤田,14对矿井、12万职工,是全国五百强企业、中国煤炭百强企业。由于形势需要,局领导准备成立局侨联组织,把我从韩桥矿调到局机关负责局侨联的筹建工作。经过一段准备工作,于1987年3月24日成立了矿务局归侨侨眷联合会。我们很荣幸得到94岁高龄的全国侨联主席

张国基的题词:“团结归侨侨眷,作好开放引进桥梁,期为建设四化贡献力量。”在他的题词精神鼓舞下,局侨联工作做出一点成绩,受到江苏省侨联、徐州市侨办、侨联的好评,并给予“爱国奉献”奖牌的表彰鼓励。

在技术职称方面,我早在1981年就获得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授予的工程师证书。1992年获得高级工程师证书并延长工作到60岁退休。

退休后我经常到厦门女儿家住,2005年6月我的户口就迁到厦门,我自然成了厦门市印联会成员。

2006年9月我获得全国侨联发给从事侨联工作20年以上的证书。2010年12月获由厦门市侨联、《鹭风报》颁发的“照片里的故事”征文活动中最具人气奖的荣誉证书。2011年11月获江苏省徐州市侨联授予的写有“心系桑梓奉献奖”和“侨联工作荣誉奖”的水晶奖杯。

在国外探亲宣传爱国思想

由于我在国外有很多亲友,因此我会经常出国出境去探望他们。1993年10月,我第二次到印尼探亲时,遇到我大学的母校“北京矿院”的老师,他们正好到印尼办理技术转让的谈判,老师有意聘请我为他们谈判的第二翻译(印尼语翻译),我不好推辞,就和老师们一起到印尼南苏门答腊的印尼国营煤矿去参加谈判。经过一周的会议,我们的老师成功把“上燃式型煤”的技术转让给了印尼国营煤矿。

在2006年到2012年间,我三次到加拿大多伦多探亲,小儿子因工作忙,无暇照料孩子,我每次去都会呆上一整年才回国。在多伦多,我经常带孙子去

幼儿园学前班,见到老外的机会较多,他们都会很客气地打招呼,甚至用中文说“你好”。有一次在幼儿园玩时突然听说“有个联欢会,家长们都要轮流唱首歌或者跳舞”,当轮到我唱歌时,我就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和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有个家长还跳起舞来了,获得满堂的掌声。我觉得只要用心,不论到哪里,都可以宣传爱国思想,唱爱国的歌。

2012年9月,应印尼雅加达邦加槟中校友会总主席凌先生的邀请,我参加了“槟中校友会”成立大会,受聘为辅导团委员。成立槟中校友会的宗旨是办三语学校,我觉得办学是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孙的大事,因

此我很欣赏他们的做法,故一连两次参加他们的会议,同时也可以回家探望自家的兄弟。

以服务侨友为宗旨的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,丰富多彩的活动载体,为传承印侨文化,展印尼侨友风采,丰富归侨生活搭建平台。在厦门印联会,我参加了各种活动。

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,我的三个子女都大学毕业了,各自成家立业,都是单位的骨干。我的四个内外孙子孙女,有的在国内外上大学、读高中,也有的在加拿大读书,个个成绩优秀,兴趣爱好广泛。我自己有退休金和医保,生活无忧无虑,正在奔小康路上安享晚年。

家庭需要比不上建设祖国重要



我出生在印尼邦加槟港市,从小在槟港华校读书,高中转到雅加达“华中”读,上高三时有幸受教于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师,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。张老师平易近人,教书育人,经常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珍惜前途,做一位有远大理想的好青年。很多学生接受他的教导,纷纷抛弃所谓暂时的富裕海外生活,踏上建设祖国的光明大道,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位。五十年代,我正青春芳华、血气方刚,进步思想的陶冶使我深深地爱上了祖国。新中国日新月异成就的感召,加之华侨寄身海外无地位,促使我确立了回到祖国献身社会主义壮丽的意愿。

1958年6月我高中毕业,回到家里把要回国上学的愿望告诉父母,父母担心我一人回国,无人照顾;再则家里的运输公司正缺人管理,需要我在身边照料家业和父母的生活,坚决不让我走。

然而,这没能阻挡我的爱国心,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8个月,守着父母讲自己爱祖国的火热心情,谈建设祖国的远大抱负,回忆父亲离乡背井漂泊到南洋谋生的辛酸往事。

父母看我回国的决心铁定,

又说我堂哥要在雅加达开办搪瓷厂要由我来掌管,我说没兴趣。经我不间断地做工作,父母勉强同意,但是给我办的却是能在12个月内返回印尼探亲的“双程护照”。1959年4月,我终于登上“芝利华”邮轮回国了。

我满怀豪情壮志,斗风搏浪七昼夜,终于胜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在香港靠岸,经香港到深圳。一踏上国土,看到五星红旗迎风招展,亲人们处处笑脸相迎,又听到广播里洋溢着亲切的问候:“同胞们,辛苦了,祖国欢迎你们!”一股暖流温暖全身,兴奋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。“真是社会主义好啊!”我情不自禁地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献身之道而高兴、庆幸。

经过海关检查行李后,我们根据自己选择的补习学校,各奔前程。我们十几位同学一起和北京补校的老师搭乘火车到校,很快就编班上课,每天都过着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。

大约在六七月份,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我们归侨学生到东北重工业基地参观学习。这对我们刚回国的归侨学生帮助很大。看到自己国家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和红旗牌轿车,还有万吨远洋货轮就在眼前,我们非常感动,相信祖国前途光明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会强盛起来,不会被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所吓倒。

我于次年考上大学。又经过5年学习,我于1965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。毕业分配时,校领导考虑到我有因印尼非常事件而回国的弟妹在北京读书,有意留我在北京工作。但我坚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到生产一线去,就离开北京,满怀建设祖国的革命热情,奔赴江苏省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。



在回国的芝利华邮轮上留影